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与界定

一、全球经济失衡与增长减速

自 2008 年发端于美国的经济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以来，虽然美国经济已有初步企稳之迹象，但欧盟、日本等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仍陷于持续走低的境地，且美国、日本等经济体都出现经济周期波动“微分化”[①] 的明显迹象。而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动力源的新兴市场国家，俄罗斯、巴西等资源型国家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持续暴跌的影响，经

① 所谓经济周期波动的微分化，是指全球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出现的较传统经济周期时间相对缩短、振幅相对下降的周期特征。

济发展也步履维艰。虽然中国、印度等国家仍维持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频繁无序变动的周期数据导致长期经济决策更加困难，高企的不确定性使 2008 年以来风险偏好显著下降的企业家们对于扩大投资或者削减开支犹豫不决，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宏观经济的复苏产生了负面拖累。

鉴于近年来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运行走势，2005 年由时任 IMF 总裁 R. Rato 所提出的全球失衡（global imbalance）这一判断近年来在政界、商界和学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一般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的“以美元为全球货币，美国以贸易和财政赤字的方式向全球其他经济体提供购买力，后发经济体由此发展外向型制造业”的传统模式在成功运作推动全球经济长波增长（尤以东亚地区为代表）半个多世纪以后，长期积累的贸易失衡、储蓄—消费失衡、财富分配失衡、资源拥有—消耗失衡、财富分配与社会发展失衡等诸多矛盾开始集中暴露，导致原有的

增长格局无以为继，最终形成所谓的“全球失衡”并愈演愈烈，而对失衡修正——如何在各种复杂约束下实现再平衡，成为亟待解决的世界性问题。2016 年 10 月，IMF 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秋季年会发布公报明确指出：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缓慢且不均衡，不仅需求复苏欲振乏力，而且部分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存在供给缺口；与危机前相比，国际贸易、各经济体的境内与跨境投资，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均不同程度地减速；国际政治和金融风险则在不断增加。受以上负面因素叠加的影响，全球经济前景在危机爆发近十年后仍然持续低迷，无论是传统经济学理论高度关注的潜在 GDP 增长率，还是近年来被决策层、理论界，乃至社会普罗大众所更多关注的包容性增长空间均不容乐观。而就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态势看，发达国家生产率的增长整体尚处于减速阶段，且各种后危机时代的遗留问题仍有待解决；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正致力于应对复杂

的结构性调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则对资源出口国造成影响。[①]按照 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预测，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高企导致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降低到 2010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3.1%），且预计在 2017 年仅能实现小幅回升。[②] 从以上明显趋于谨慎的判断可见，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中，传统国际格局失衡长期积累的高杠杆与过度创新等所引发的金融风险、产能过剩与贸易不均衡等所引发的实体经济风险、收入在不同经济体与不同社会阶层间分配不均所引发的社会风险，乃至在再平衡过程中可能爆发的地缘政治风险……上述各种风险的应对策略与国际合作机制选择，不仅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实践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实践问题。

二、中国何为？

① 相关细节详见 IMF 官网的会议简报，http://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6/10/08/am16-cm100816-communique-of-the-thirty-fourth-meeting-of-the-imfc。

② 报告文稿详见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6/02/。

按照最早提出“全球失衡”的 R. Rato 主要从国际经济角度来定义：“全球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对应当下国际经济形势，这意味着失衡问题最突出和集中地体现在美国（作为主要的赤字提供方）和中国（作为主要的盈余获得方）这两个具有全球影响的当今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而国际经济的失衡现状以及构建再平衡机制的迫切要求，则意味着这一已经持续三十余年的国际贸易、分工与金融体系有进行巨大调整的需要。众所周知，中国在过去三十余年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事实上从上述国际贸易、分工与金融体系中获益良多，这个体系的任何改变，都会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如何应对，是当下中国政府、学界、商界乃至社会公众都集中关心的问题。

换言之，失衡及再平衡的过程对于中国这个经济外向化程度

极高、且正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历史性任务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如果说中国在过去三十余年时间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中主要扮演追随者（上述长波增长周期肇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中国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方开始介入）和受益方（自 1978 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通过积极主动参与上述体系，依托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吸引巨额海外资本流入，以产品输出的方式成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不仅在纺织工业、消费电子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产业领域早已确立了市场龙头的地位，近年来甚至在以高铁、核电、特高压输变电技术等为代表的若干新兴战略产业中也已初步成长为全球产业领袖）的角色，而在目前的全球增长格局中则需要逐步转变为主要领导者之一和利益分享（输出）方之一。简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迄今为止所形成的国际经济格局是由美国主导安排所形成，而鉴于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据估

算，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 GDP 在全球 GDP 的占比高达 40% 以上，而 2015 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 25% 以下）和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快速成长（按照 IMF 的最新报告，中国、巴西、印度已分别排全球 GDP 的第二位、第七位和第九位），上述传统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现有的国际经济格局发展形势，事实上其已成为现有国际经济失衡的深层次根源。我们认为，考虑到中国在全球资源市场和产品市场业已形成的市场地位，从追随者到主要领导者之一、从受益方到利益分享方的两个转变，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成长到现阶段所需要承担的国际经济合作义务的自然体现，也是中国经济在产能、资金、技术和制度等方面充分发挥既有优势，进一步确立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增长“火车头”地位的必然要求。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6 年 IMF 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

告》中，即以专章讨论“中国转型与移民的溢出效应”，明确提出以下观点：中国经济的平稳和发展具有全球性影响，尤其对能源和产品出口国、全球金融市场都有巨大的溢出效应，承担着全球经济的“基石”作用。[③]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进一步作为全球增长“火车头”，不仅是中国社会的自我期许，更是国际社会在面临复杂的现实经济困境下的普遍期望。

显然，要实现“从追随者到主要领导者之一、从受益方到利益分享方”的两个转变，虽然是中国经济实力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无疑意味着原有国际经济格局安排的重大改变，可能受到原有制度安排中各利益攸关方的高度关注、怀疑乃至各种杯葛。要有效化解可能面临的各方面的各种疑虑误解，则需要我们为中国所倡导的未来国际经济格局提供能为全球各方所理解、体认和接受

---

③ 该章报告题目为《Spillovers from Migration and China's Transition（移民与中国转型的溢出）》，全文见 http://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6/09/26/AM16-NA270916-Spillovers-from-Chinas-transition-and-migration。

的理论阐述。简言之，按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④] 的观点："要想考察任何有意义的人类行为的根本成分，首先应从'目的'和'手段'这两个范畴入手。"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构建过程中，中国同样需要通过一个完整的理论阐述，很好地解释其目的和手段——"这个新格局能够为世界带来什么（目的）；这个新格局将通过什么方式构建（手段）"。

毋庸讳言，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要在这轮复杂的再平衡进程中有效地兼顾国家利益和国际义务，就需要完整地构建出逻辑自洽的理论阐述，并为全球各方理解、体认与接收。这个理论阐述的构建，既是一个庞大的理论工程，更是一个庞大的历史实践。鉴于涉及全球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经济体（均为利益攸关方），涉及各国政府、各国际经济组织以及大量企业乃至个人

---

④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和哲学家，被公认为现代社会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同样是利益攸关方），涉及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各个部门，因此本书的初步研究将首先以理论框架的构建为主线，通过选择科学的方法论，为全书的研究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支持和指导，进而展开对全球失衡与再平衡问题的多维度分析，力求探寻其（主要是经济层面的）发展逻辑与解决对策。最终，本书将借鉴发展经济学中的雁型模式探讨和阐述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可以将基于充分国际合作的“超级项目”作为解决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手段（之一），以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将本书所集中分析的再平衡机制定义为“增量再平衡”，是基于本书采用“历史—比较研究”这一方法论（详见下节）进行梳理后发现，全球性战略格局的完全更替，需要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漫长演进。以英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被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代替为例，众所周知，自 1776 年《独立宣言》发表之后，美国凭借其优越的要素禀赋（广袤的土地、优良

的自然资源、源源不断的高质量外来移民等)、稳定的国内局势(除南北战争外即再无内战，一直保证了法统的延续)，加之远离欧洲大陆的纷争与战火，其经济发展可谓具有若干得天独厚之优势。但即使如此，美国自建国之后近120年的发展才初步在若干国民收入指标上超过了英伦三岛，而最终取代英国全球经济第一的地位。彻底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战略格局，则迟至20世纪40～50年代随着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和英国的庞大海外殖民体系崩溃。换言之，在工业化、全球化以后唯一的一次国际格局的彻底转换，从以英国面临新兴大国的直接竞争挑战(欧洲史研究的一般观点认为工业革命以降是德国最早开始真正挑战英国的主导地位，其时间大致在1870年德国统一以后)开始，到英国最终守成失败，花费了近80年时间；而如果从美国独立算起到最终取代英国的主导地位，则花费了约180年时间。从这个角度看，现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形成的以美国为主

导的国际格局，虽然期间也曾经受到苏联、日本等经济体的挑战，但整体而言尚无任何一个经济体能够达到19世纪末期的德国、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美国对守成的英国曾经达到的竞争压力，而中国的大国崛起进程，即使以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进程为起点，迄今为止也仅延续了不到40年。因此，本书将未来以美国、中国两大经济体通过全面战略对话所实现的“再平衡”机制，定义为“增量再平衡”，以强调在当前的现实环境下无论是美国还是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都没有对原有格局进行“颠覆性”改变的意愿。之所以形成这个基础判断，不仅是基于中美两国国家利益取向的理由：中美事实上被公认为过去30余年在传统格局中获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从结果上即体现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成长，以及美国在所有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体中相对健康的宏观经济态势⑤），而且是中美两国领导人所确定的“新型大国

⑤ 以最近两年的GDP增长率看，2014、2015年美国均为2.43%；欧盟分

关系”的内涵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显然，在国际经济格局上，这一“合作共赢”可视为在维持原有基础性框架的前提下，双方对作为“存量”的彼此传统核心利益有足够的尊重和照顾，而更多地致力于推动广泛的国际合作以实现“增量再平衡”。我们认为，这不仅对于解决当下的国际经济“失衡”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显然“边际”意义上的改进会比全面的基础性“颠覆”更具现实的可操作性与可接受性①，甚至可望为解决中美之间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② 问题提供战略缓冲。

别为 1.4% 和 1.9%，日本分别 - 0.03% 和 0.47%。其中，美国、日本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欧盟数据来自欧盟官网。

① 这里所说的“增量”或“边际”意义上的改进并不排斥在未来取得普遍的全球共识的基础上对现有格局进行整体“颠覆”的可能，而是强调在现阶段主要的利益攸关方（如本书所集中分析的中美两大经济体）仍有广阔合作空间与合作意愿的背景下通过增量再平衡实现边际意义的改进的现实空间。

②“修昔底德陷阱”是由哈佛大学教授 Graham Allison 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描述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进行全面挑战所引发的结构性乃至全局性紧张关系。